

范蠡致富新考

[作者] 王绥臻

[单位] 南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摘要] 范蠡为越王勾践谋臣 20 余年，官拜上将军，功成身退，隐居于齐、陶。再战商界，十九年间“三致千金”。他的经营富家思想是其治国用兵思想的延伸，范蠡致富，是其灵活应用经营富家思想的结果。本文尝试从文化资本角度出发，结合之前范蠡研究的诸多成果，推导出地利资本、人际资本等因素，力图用新观点、新角度破解、诠释范蠡成功地“三致千金”的内外因素及对现当代企业运营的教益。

[关键词] 范蠡；经营思想；文化资本

范蠡（生卒年月不详），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会齐、晋诸侯于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致贡于周，称霸天下，官拜上将军。后辞越北上，先后迁齐国，居定陶，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因聚财有方，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1]冯友兰先生晚年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编第六章第五节“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思想在范蠡的政治策略中的表现”，对范蠡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饶恒久（2001）考据了范蠡的籍贯、故乡，进而探求了南阳之地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楚始祖鬻熊和姜太公吕尚——对范蠡思想可能产生的影响，初步揭示了范蠡的思想渊源。[2]

范蠡是中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博学多识与传奇般的实践，卓然超脱的人格魅力，战国以来诸子交相称誉。在筹划兴越灭吴的过程中，范蠡以笔和剑投入时代的潮头，是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改变了历史的思想家，属于中国古代史上为数不多的俊秀。从春秋到秦汉的学术史、思想史上，范蠡都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巨子，具有深厚的文化资本，思想博大精深。他的经营富家思想是其治国用兵思想的延伸，这两个方面学界已给予较多的关注，而本文旨在探究他的经营富家思想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其对现代企业运营的教益。范蠡为什么能迅速地白手起家，三致千金呢？本文尝试着从文化资本论中，推演出范蠡成功创业的因素，借以解释这些问题。所论均依据史料和当代范蠡研究的最新成果，望方家斧正。

文化资本——范蠡创业成功的主观因素

所谓文化资本主要是指对社会上层文化的熟悉和掌握程度，它包括各种符合上层文化的行为、习惯和态度。范蠡之所以能够帮助勾践完成复国雪耻、称霸诸侯的大业，能够弃官经商，“三致千金”，成为垂名后世的实业家——“陶朱公”，根源在于他自身的文化资本底蕴作为内因奠定了基穿。饶恒久考据了范蠡的籍贯、故乡，进而探求了南阳之地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人物——楚始祖鬻熊和姜太公吕尚——对范蠡思想可能产生的影响，初步揭示了范蠡的思想渊源，论证了范蠡思想中具有领先于同时代的特点。

由于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传递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因而人们一般注意到经济资本的传承机制及其对人们社会地位、权利获取的影响，而未能看到文化资本的拥有丰度及其传递对人们获取经济资本、权利资本的重要影响。事实上通过文化资本的获取进而可以改变原有经济资本、权利资本的分配格局。

范蠡入越之前的情况，先秦典籍中并没有相关记载，但在后世的《越绝书·越绝外传记策考第七》中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文种）得蠡而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倾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和意同，胡越相从。”由此可见，范蠡年轻时虽然生活贫困，但独有所学，胸怀霸王之道，即使一时不为乡里常人所理解。后为县令文种发现，引为知己，二人相约共勉，欲去楚赴越，共建奇

功。

假若范蠡只是一个平凡的乡民，见识平庸，文种不会引为知己。由此可见，文化资本在范蠡初出茅庐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使得社会成员有较高的平台进入上层社会或有通道穿透社会阶层阶级的信任阻隔，借此改变了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地位。[3]与文种相识相知，进而共同赴越辅佐勾践，历经兵败会稽山、入吴为奴、忍辱存越、长达八年的守志待时等，最后战略进攻，立断灭吴，成就越国霸业——范蠡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他能够胜任“存越、灭吴、争霸”的历史重任。同样，到了他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从商时，文化资本仍是他最大的财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这样记载：“范蠡自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吾欲用之家。”从而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富行其德是范蠡文化资本中重要的一面，范蠡并不把经济利益作为经营活动追求的唯一目标，在他的经营理念中，行德济众是一项重要内容。《史记·货殖列传》称他为“富好行其德者也”。“富”乃自身经济发达。范蠡离越后，居齐、迁陶，十九年中曾“三致千金”，而在他年老之后，子孙修其业而“遂至钜万”。“德”乃以己助人。在他的行为中，“德”不是抽象的道义律条，而是经济上施与他人实实在在的利益。他在去齐迁陶时，曾“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勾践世家》）。表面上是弃官离乡的无奈之举，骨子里却是心甘情愿的，因为这与他乐善好施的个性相一贯。他“三致千金”后都曾“再分散与贫交昆弟”。虽然施赠对象不出乡党、昆弟、知交的范围，尚非广济，但从财力和伦理方面看，也在情理之中。可谓为富一家，利泽一方。

由此可以看出范蠡对富与德关系的认识已达到辨证的高度。致富需重财、聚财，行德则要轻财、弃财、散财，就“财”而观之，二者是矛盾的。但范蠡认为富与德并不相妨。他把富看作德的基础和条件，将德规定为富的归属。只有先富，才能后行其德，而且所行之德方显出实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致富之后又必须行其德，过分看重财物反而会被其所累。居陶之时，范蠡曾遣长子携千金，到楚国救其中男而终归失败的典故，颇能验证这一观念。通过文化资本的获取进而可以改变原有经济资本、权利资本的分配格局，故范蠡虽十九年间曾“三致千金”，尽散其财，但并没有就此贫穷，而是继续富有，其中的奥秘还在于其基于文化资本之上的地利资本和人际资本。

地利资本——范蠡创业成功的战略选择

范蠡之所以选定齐、陶两地治产，一是他在这两地的人际资本能帮助他躲过越王勾践的追杀；二是他用文化资本炼就的战略眼光基于“择人任势”（《孙子·势篇》）的兵法原则而选定的。

史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帛渔盐”（《史记·齐太公世家》）。特别是齐桓公任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汉书·地理志》），“令商人群聚而州处”、“商人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从而使齐国“家殷而富，志高而扬”（《左传·宣公十二年》），成为发财致富理想之地。范蠡在齐国时“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在此期间，他还指导齐国国君在后苑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万。

范蠡挂印离开齐国后，认为“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列传》）。《货殖列传》又说“三河在天下之中”，“加以商贾”。定陶适近“三河”之地，交通便利，物流极畅，便于进行商业贸易。子贡就曾“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定陶前属曹，后归宋。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35页）和蒋晓伟《中国经济发展史》（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也都确认定陶为当时的商业都市。陶东边为齐国，多文采布帛渔盐；北为赵国，富鱼、盐、枣、粟；南有邹、鲁，颇有桑麻之业，上述各国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是比较富强的国家，诸国丰富多样的物产可为范蠡经商提供充足的货源和广阔的市场 [5]

范蠡在齐国时，像老百姓那样“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凭着“父子治产”，“致产

数千万”。（《勾践世家》）在定陶定居下来后，他采醜“以未致财，以本手之”的农商结合方式，开始了再一次的创业：“于是自谓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富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勾践世家》）。《货殖列传》将这一情节记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范蠡采取了农工商结合的产业运营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究竟从事何种行业，司马迁语焉不详。固然范蠡家族里有一批能工巧匠，精通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甚至是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人力资本丰厚——一个人拥有如此身家，地利人和样样具备，想不成功都难，况且他是以智勇闻名当世的越国上将军范蠡。然而春秋战国时代，有哪些行业可以使人迅速地积起大量财富呢？谁有这么大的购买力？揭开这些疑问，或许可以为今人揭示范蠡致富的奥秘。

据文献记载，其时已设有专门基地，役使专人饲养鸡、猪，供军队食用。在越的农业经济中，经济作物的栽种也是很突出的，其时越设有专门的基地种麻、种葛，《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说：“麻林山，一名多山，勾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又说：“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同时也种桑和蚕，“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农桑”。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越人的艰辛劳动（更由于战争的重压下激发的战斗精神所致），无论是农业或者是手工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中有些部门，如水稻的种植，青铜剑的制造，葛布的生产，原始瓷的烧制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等，在当时的中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前面已分析过范蠡人力资本的构成，极有可能存在这么一种情况：范蠡家族所从事的行业与上述几个产业密切相关。[6]而这些产业除保障生产、生活消费用之外，无一不与战争有莫大关联。亦即，范蠡生产和经营的产业，不排除是为战争服务的战备物资的可能！只有国家才具有如此强大购买力的可能性。

人际资本——范蠡创业成功的客观因素

在此笔者把社会关系资本称为人际资本。西方社会通过文化资本的传递而实现阶层穿透的观点可用来解释文化资本如何促进人际资本和编织社会关系网络。因为这种穿透过程，使文化资本有助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和职业地位，有助于与上层阶级的人进行社会交往，广结社会关系。正是这种阶级识别作用和信任穿透作用，使得较高文化资本的拥有者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和进入上层社会。弄懂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范蠡的人际资本。人际资本就是指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这个资源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权利、地位、财富、金钱、学识、信息等等，通过社会网络，人们可以获得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4]

范蠡长期主政越国军事、经济、外交，曾针对死而复生的越国，面对强大到足以北上称霸中原的吴国的威胁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制定了战略方针：即外交方面，卑弱以自持，柔顺以事吴，同时接好齐国，亲近楚国，依附晋国。静观守志，以待时机。范蠡曾出于战略需要，而凭借自身的文化资本，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凝聚了自己的社会关系资本。

越灭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举措，完成了称霸诸侯的壮举，从中也显示了范蠡作为政治家的远见，为他后日的归隐作了铺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这些举措，都是为实现霸业这个总目标而精心设计的，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尊周王，历来是春秋霸主的一面颇有号召力的大旗，得到周天子的封赐与齐晋等中原大会盟，是实现霸业的一种标志；归还楚国淮上之地，是对近邻的一种安抚；怀柔宋鲁等小国，则可以增强它们对越的向心力，提高越国的威望。这些，固然是勾践所实行的，

主意却出自范蠡。司马迁写道：“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取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

当政二十余年的范蠡早有预见灭吴后要弃越归隐。他的思想接近于黄老的思想，功遂、名成、身退自是应有之意。二十余年铺下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就了勾践的霸业，也帮助范蠡安然从越国离开，“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由这段史料可知，范蠡选定的隐居地是富饶的齐国。

倘若范蠡在齐国没有权贵接应，他要在齐国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此时的范蠡已不是当初与文种赴越时的孑然一身了，而是代表着一个大家族，它包括范蠡二十余年招揽的门人宾客。范蠡家族的迁徙即为典型的移民行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员的大规模自由迁徙受到很大限制。范蠡宗族定居齐国，必定受到重重盘查——若非有权贵庇护，他逃不过越王勾践的探子。正是存在这么一个权贵帮助范蠡，他才有可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苦身戮力”地“耕于海畔”，凭着“父子治产”，“致产数千万”。也正因为这个权贵，范蠡才被齐王发现他的贤能，重用为相。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范蠡生产和经营的产业，不排除是为战争服务的战备物资的可能！只有国家才具有如此强大的购买力的可能性。

郑观应指出：“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皆去。”那时就有不少私人资本企业，为了求得官方的保护，自愿挂上“官督商办”的牌子。这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官府在扶持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当年一个巨贾富商要壮大，须搞好四件事——官事、江湖事、洋事、商事，后三者指的是江湖道上往来、同洋人打好交道与发展商务本身，而首当其冲的官事指的就是政商关系。

这种官商结合的现象一直延续下来，到中国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在这段时间内，许多计划经济的习惯行为尚未革除，成为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抑制因素，为数甚多的经营者出于逐利的目的，极力向行政权力寻求“保护嫂”，实行官商共谋。

当前我国的民营企业存在“行为的政治化”倾向，即民营老板为更进一步筹得资金常常“拉大旗做虎皮”，通过种种暗箱操作，与政府高官要员之间攀上似是而非的关系，甚至通过炒作等手段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因为他们的内心十分清楚，政府的权力对经济活动渗透得太深。而权力一进入经济领域，不仅市场经济不成为市场经济，而且社会的财富会通过权力以各种方式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抱着这样的想法，为数甚多的企业家把重点放在搞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上，上海人讲“摆平”，广东人讲“搞掂”。商业领域和企业活动的不独立，既限制和束缚了企业经营者的活动范围和自由，也不利于商业信用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因而妨碍了企业家人格的成长。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要想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主要不是依靠本人的经商才能，而是依靠通过权力获得资源的能力。也正因此，中国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范蠡作为商人的始祖，领风气之先，开政商结合的先河，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商业文化。而当前的重要课题却在于，企业家如何确立企业家人格，从而成长为独立的阶层，同时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综上所述，范蠡的文化资本、地利资本和人际资本根源于他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富国强兵的高度上赋予商业以重要的意义，从而提出本末并重、农商皆利的思想，进而由天时而地利到人和，层层展开、充实。随时逐利重在把握天时；“富行其德”意在人和；“善择其处”以尽地利；其思维具有时代特点而理论成果又独树一帜，相辅相成。《史记》所载“范蠡三迁”，他的意义不在于叙述某个人的发迹史，而是反映了地主型商人资本在我国封建社会早

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我国早期商人、地主、官僚三者结为一体的一个缩影。范蠡作为商人的始祖，领风气之先，开政商结合的先河，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商业文化。

[参考文献]

- [1]张习孔、田钰主编.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6
- [2]饶恒久. 试论鬻熊、吕尚对范蠡思想的影响[J]. 兰州大学学报. 2001, (2): 71-79
- [3]布尔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10-211
- [4]储小平. 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和文化资本[J]. 学术研究, 2003, (11): 15-19
- [5]吕世忠. 试论范蠡的经济思想[J]. 东岳论坛. 1998, (4) .
- [6]辛土成. 试论春秋战国时代於越的社会经济[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2, (2): 91-98.

Research o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Fan Li's Success

Wang Sui-zhe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473061)

Abstract: Fan Li, once an excellent counselor of Kingdom Yue (in the Period of Spring and Autumn),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Gou Jian for over twenty years, went into business after his resignation. With the flexible management, he made a considerable fortune in Qi and Tao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his success: cultural capital, friendly social relation, favorable geographical position, which can give us enlightenment for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Key words: Fan Li, the flexible management, cultural capital

[指导老师] 赵秀玲, 女, 教授, 南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主任, 范蠡与中国商业文化思想研究所副所长

[作者简介] 王绥臻, 男, 南阳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03 级本科生, 范蠡商业文化思想研究论坛学生会长。